

年红成人本位视域下的儿童文学创作

张泰忠、潘碧丝*

马来西亚大学文学暨社会科学学院中文系、马来西亚大学中国研究所

摘要

年红是马来西亚资深的儿童文学作家，自 1957 年马来西亚独立后开始创作至今，共出版了 86 本儿童文学作品。他积极推广马华儿童文学，创办南马文艺研究会，其贡献获得了国内外机构的肯定，多次受邀到多个国家主讲“儿童文学”的课题。本文通过文本细读，分析年红作品中儿童人物的特点，探讨年红如何借由作品教育儿童读者，尤其是选择站在成人本位的视角，在作品中塑造华人传统视域下的儿童形象并探究其背后的原因，以及成人本位写作手法对当代马来西亚儿童文学的影响。

关键词：年红，马华文学，华文儿童文学，儿童观，成人本位

* 张泰忠，硕士生，马来西亚大学社会暨科学学院中文系；潘碧丝，博士，马来西亚大学中国研究所高级讲师。

Children's Literature Creation of Nian Hong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Adult

TEO Thai Chong, FAN Pik Shy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alaya,
Institute of China Studies, University of Malaya*

Abstract

Nian Hong is an established Children's Literature author of Malaysia, actively publishing since Malaysia's independence in 1957 till today. With 86 Children's Literature works under his belt, he has been actively promoting Malaysian Chinese Children's Literature and founded the Literary Arts Research Association of South Malaya. His contributions to the field garnered praise and affirmation by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with him being invited to deliver lectures on the topic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in various countries. Through close reading, this text attempts to analyse the child characters in Nian Hong's stories, investigate how his works are educating its young readers through the perspective of an adult, explore the reasons behind him shaping characters morality from the expectation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how writing from the adult perspective influenced the field of Malaysian Children's Literature in that era.

Keywords: Nian Hong, Malaysian Chinese literature, Chinese children's literature, child's point of view, perspective of adult

年红，原名张发，马来西亚华文儿童文学资深作家。年红在 1961 年发表第一部儿童文学作品集《黄瓜公主》后，积极创作和推动马华儿童文学的发展。他在国内外出版了 86 本儿童文学作品，也多次受邀到师范学院及多个国家主讲“马华儿童文学”的课题。年红超过半世纪的儿童文学创作经验和推广马华儿童文学的贡献，是研究马来西亚华儿童文学不可忽略的对象。

一、年红的成人本位教育观

年红是儿童文学作家，也是一名教师。他重视儿童文学作品的教育价值，与马来西亚华社的文学观念和历史发展背景息息相关。马来西亚华文文学（马华文学）“创作的主要倾向，一开始就是现实主义的……现实主义的精神却始终像一根红线一样，贯串着全部的创作历史，体现在所有重要的作品里面，成了文学创作的主流”（方修 2017: 39）。身处在主张现实主义创作时代的年红，也自然地选择创作反映现实生活面貌和社会课题的作品，无论是短篇小说或儿童文学作品。

上个世纪中期，马华文坛上创作儿童文学的作家不多（年红 2005: 193），市场上大多数的华文儿童文学读物主要来自香港和台湾（年红 2005: 233-234），以及西方的翻译品（廖冰凌 2011: 273），年红身为教师，深刻明白儿童文学身负民族文化遗产的重要性（年红 2005: XXXVII），呼吁马华作家多创作具有民族和本土特色的儿童文学作品，以期“儿童读者在阅读中认识认识自己的国家，了解同胞的生活，进而培养他们热爱民族，热爱国土的精神”（年红 1979: 8）。年红强调本土特色的儿童文学观念在与中国学者王泉根的一次访谈中提到的“同源多元”的儿童文学观念得到进一步的肯定：“世界华文儿童文学创作应该在有选择地吸纳中华传统文化精华的同时，表现出各自独特本土文化个性与现代文明取向，以一种多姿多彩的多元风貌，共同丰富着世界华文儿童文学的艺术宝库”（年红 2005: 212）。

王泉根提出的“同源多元”的儿童文学观念，以及把年红的多篇作品收入到《世界华文儿童文学大系》的举动，增加年红强调本土特色的儿童文学观念的信心，也肯定了年红与和同时期的儿童文学作家自马来西亚独立以来坚持借用儿童文学教育少儿读者以传承华人文化的做法。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年红成人本位的儿童文学创作观和他所处时代有着密切关系。

马来西亚独立之后, 国家实行免费教育制度, 新一代孩童得以上学。然而许多孩童出身劳动家庭, 行为举止没有得到良好的指导, 自幼养成很多不良习惯和不适合时代的价值观。年红认为成人的人生历练丰富, 对人生有更深刻的思考。出于呵护和培育儿童的目的, 年红带着个人的人生经历总结去为儿童写作, 期望能够协助儿童健康成长, 帮助他们在成长中完善自己, 将来走上康庄大道(佩里·诺德曼著 2008: 154-155)。这意味着, 年红认为优秀的儿童文学, 应该可以让儿童通过阅读发现自身的不足, 从而纠正不良品行和观念。他特别赞成浩然的说法: “对好的表扬歌颂, 让读者学习好榜样; 对坏的揭露讽刺, 提醒读者防备坏的影响。这些是我创作儿童文学的艺术观的具体表现”(年红 2005: 142)。

在这个前提下, 年红的儿童文学以教育为主, 借儿童的行为传达他的价值观。年红有目的性地在生活中收集儿童品行问题的素材, 也带着歌颂理想儿童形象的目的进行儿童文学创作, 以期能够借助儿童文学作品教育儿童读者。通过年红笔下的儿童人物形象的分析, 我们发现年红作品中的儿童人物可划分为两类, 即理想的儿童人物和需要改善的儿童人物, 而“理想”或“需要改善”的概念, 都是建立在成人的价值观上。

二、儿童需要引导向善

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马来西亚, 优秀的儿童读物匮乏, 电视节目往往是许多儿童的主要精神粮食。受到当时传媒广告和电视剧情节的影响, 这些孩童养成过度重视事物外形, 忽视事物功能的想法(年红 2015: 70-74)。年红在其作品中大量描述了类似重视物质享受的儿童, 不过他们在经历挫败或者经过成人开导后都会自我反省, 承认自己的错误, 摒弃成人眼里不切实际的行为和想法。比如小说《魔轮》中, 主人翁“我”为了获取脚踏车, 刻意逃学、结交损友, 伤透母亲的心, 不过最终懊悔当初而改过自新: “我哭了一个晚上。我知道, 妈妈也哭了一个晚上……我很少去回想妈妈的话, 但是, 今晚却一直让那声音在我的耳边响着, 像一支一支的针, 刺痛了我的心”(年红 1988: 30)。

年红当教师的年代, 正是社会转型的时代, 大量的商业广告出现在电视荧幕上, 诱惑消费者购买色彩缤纷的产品, 许多来自经济能力不佳家庭的孩子因此向往新颖的物品, 有时不顾家里经济能力, 非要得到该物品不可的行为(年红 2015: 88-90)。如, 《新年礼物》中的小芬原想购买一双鞋子, 到了商店, 看到美

丽的花瓶，最后选择了花瓶，而不是迫切需要的鞋子（年红 1976）；〈一把大雨伞〉中的“我”嫌弃父亲递给他的传统油布伞款式老旧，担心其他同学看到而笑他，觉得这样很没有面子，因此不愿带油布伞到校（年红 1989）；〈毛毛的羽毛球拍〉中的毛毛不愿意使用父亲的旧式羽毛球拍，强迫父亲购买昂贵的新款羽毛球拍给他，让他跟上时髦（年红 1989）。年红在这些故事的初始，都设置了一个重视事物外观多于功能的儿童，由于父母的经济能力无法满足他们的要求，而对父母不满。随着故事的发展，这一些儿童皆会在遭受挫败与教训，并意识到自己的愚昧无知，了解到父母的爱心，无关新、旧、贵、贱，也接受事物实用为主的观念，做到知错能改，善莫大焉的良好模范。

年红长期在华文小学服务，接触学生和家长的比较多，他将最常见的儿童心理表现在他的儿童文学作品中。他看到来自不同工作行业的家庭，父母对孩子的教育极为重视，不辞劳苦将孩子送入华小受教育，而孩子来到群体的空间中，有了比较，开始对父母的工作有了嫌弃之心。因此在他的作品中，其多篇作品描述儿童从职业的种类判断存在价值的例子，如〈清道夫〉故事中，萧一明嘲笑陆小奇同学的爸爸是一位清道夫：“我，我笑你爸爸！原来，他是坐在垃圾车上，到处倒垃圾的清道夫！哈哈哈……瞧他拿了一枝大扫把，穿得破破烂烂，坐垃圾车的后头，那样子，还不好笑？哈哈哈……”（年红 1984: 45-46）。萧一明后来经过老师的开导，了解工作不分贵贱，任何对社会有贡献工作，都应该得到尊重的道理，而陆小奇也不以爸爸是一位清道夫为耻。

《妈妈，我错了》中的小玲也因瞧不起母亲是洗衣工人的身份，担心受到同学们的耻笑，禁止母亲到校找她，伤透了母亲的心（年红 1976）；《爸爸的老板》中的真英不解事业有成的爸爸为何将小学老师当成最敬爱之人，处处显示对老师的尊重（年红 1976）。这些小孩，认为专业人士比较有尊严，从事劳动工作是没有脸面的，因此不敢让同学知道家长的工作性质，也为家长的工作感到羞愧。年红在作品中，交代儿童对职业的错误理解之后，安排长辈向儿童讲解职业不分贵贱，行行都有其价值的情节。最终，这些儿童在长辈的开导后觉悟，意识到自己错误的想法，从而改变态度，以父母的职业为荣，亲子的关系也得到改善，作品也达到教育的功效。

儿童文学教育功能论一直在年红的作品中得到验证。他在 2008 年发表的五篇幼儿童话中，也采用了具有不良习惯的儿童后来得到了教导而改变的写法。

《骄傲的多脚王子》写多脚王子以多脚为标准的主观看法, 不愿跟脚比他少的动物做朋友(年红 2008); 《小蜜蜂生病了》中的小蜜蜂经常偷懒, 因为不想去工作而假装生病(年红 2008); 《喜欢乱扔东西的东东》里的东东喜新厌旧, 每见一样新的食物, 就扔了手上的食物(年红 2008); 《想当英雄的小花猫》中的小花猫不脚踏实地, 不屑抓老鼠, 而到处用叫声来吓唬其他动物以检验自己的能力(年红 2008); 《小乌鸦学唱歌》中的小乌鸦羡慕他人的特长, 努力学习其他鸟类唱歌(年红 2008)。这一些拟人化的鸟兽, 皆有成人眼中的不良的行为, 如骄傲、说谎、浪费、好高骛远和懒散的态度。

在小孩成长过程中, 这些都是常见的行为, 因此年红在故事中, 描写他们不合社会规范的态度, 接着描写他们在生活中受到挫折, 知道自己的过错, 然后向同学和长辈道歉为结束。毫无疑问, 年红这些幼儿童话是基于改善儿童品行问题为目标, 具有明确的指导性质和教育意味, 引导儿童成为成人眼中良好品德的人。年红在后期创作的幼儿童话也如同 80 年代创作的儿童小说一样, 通过刻画一个个有缺点的儿童形象及其反省的情节来教育儿童读者。

三、儿童必须听从长辈教诲

儿童在成长的过程中, 常会因为不依从成人指示, 而受到责罚。为了纠正儿童不听劝的行为, 成人会试图通过诱导、警告或责罚等方式, 教育儿童顺从成人的指示, 听取成人意见。年红身在教育界, 目睹许多顽固、不听劝导、坚持己见, 在团体生活中被同学排挤或在团体生活中制造麻烦和纷争的儿童, 因而把这些儿童当成写作的素材。

那些顽固且不听劝告的儿童形象, 最早出现在年红 1962 年的寓言故事《自作聪明的猎人》。作品内, 青少年沙哈伦不听老猎人的劝告, 最终招致被老虎咬死的下场(年红 1962)。类似的儿童人物形象也出现在年红的其它儿童文学作品之中, 特别是教育广播剧本和童话故事。例如, 年红在 1976 年发表的《学生剧场丛书》中的八本教育广播剧本《哥哥的彩色笔》《新年礼物》《教室是大家的》《大扫除》《助人为快乐之本》《一把小剪刀》《女班长》《捣蜂窝》、1977 年发表的教育广播剧本集《播种的人》中的〈播种的人〉和 1984 年《小飞侠》寓言故事集中收录的五篇教育广播剧本〈小飞侠〉〈清道夫〉〈小泥人〉〈不分彼此〉〈新同学〉皆聚焦在不听取成人和友人劝告的儿童。这 14 篇作品发表于 1976 年至

1984 年之间，创造了不听劝告的儿童为故事的主人翁，描绘他们因不听话及随后遭遇教训的经过。例如：《捣蜂窝》中，大牛为了吃蜂蜜，要求两位朋友协助他捣下树上蜂窝。两位朋友好心相劝，换来大牛的责骂。最终，大牛被蜜蜂叮咬，送入紧急部门抢救。年红期望通过批评大牛的愚昧与无礼，能够教育儿童读者做个懂得思考和听取朋友劝告的好孩子。

另外，年红六篇发表在 1962 年至 2008 年之间的童话故事：〈猫为什么要抓老鼠〉〈黄色孩儿〉〈小花猫和小灰鼠〉（收录在《年红儿童文学选》（2009））《小乌鸦学唱歌》（2008）《想当英雄的小花猫》（2008）《离群的小海鸥沙沙》（1998），也都是以不听劝告的孩童为故事的主人翁，后来因为自己的固执行为而遭受不幸，以警惕正在成长中的儿童遵守社会的规矩。例如，〈黄色孩儿〉中，黄色孩儿不听妈妈的劝告，尝试把自己染成黑色。这导致母亲无法辨识与接纳它，造成其最终落得孤苦伶仃与面临饿死的下场。

现实生活中，不管是成人或儿童，偶会有为自己利益着想，不顾他人利益和感受的行为。年红也意识到这一点，试图利用儿童文学纠正儿童自私自利的态度，培育出具有同理心和怜悯心的完善儿童。年红在其作品之中刻画了自私自利的典型儿童形象。比如：收录在 1976 年出版的《学生剧场丛书》一书中的《助人为快乐之本》，刻画一个不愿捐助分毫给残疾人士的郑大同，在经历短暂失明和父亲开导之后，意识到以前的自私行为是错误的，决定捐出零用钱和参与募捐队伍，去帮助不幸的人们：“父：孩子，其实，你只不过尝到了其中一点点的苦痛滋味罢了。告诉你，我们生活的圈子里，只要你小心去观察一下，你就会发现，还有许许多多不幸的人，无时无刻不在求生的道路上挣扎着！同：以后，我们一定要拿出力量来，救助他们”（年红 1976: 13-14）。

如同郑大同一样的自私的儿童人物也出现在丛书的另外六篇教育广播剧本：《一把小剪刀》（1976）、《一本故事书》（1976）、《妈妈，我错了》（1976）、《大扫除》（1976）、〈郑明量的大皮球〉〈不分彼此〉（收录在《小飞侠》（1984））和三篇儿童小说：〈展览会上的明星〉（收录在《外公的红跑车》（1986））和〈毛毛的羽毛球拍〉及〈魔轮〉（收录在《魔轮》（1988））。例如，教育广播剧本《大扫除》中，郑明量和林木在老师开导之后，意识到他们为获胜而使手段的行为并不正确；儿童小说〈展览会上的明星〉中，骄傲自大及不愿小组合作的赵思旺在比赛落败和聆听校长的训话后，反省自身自私的行为。

年红以上的作品创作年代相隔 46 年。然而, 不论是 16 篇发表于 1976 年至 1984 年教育广播剧本、四篇发表于 1962 年至 1989 年的儿童小说, 或者九篇发表于 1962 年到 2009 年童话故事, 皆传达出“儿童要听长辈的话, 知错要改, 不然会受到惩罚”的教育观念, 希望借一些行为不良、顽固、自私自利、蛮横霸道、不听劝告儿童等的经历, 教育儿童读者, 要改变他们的态度, 期望他们成为品行端正和有积极人生观的儿童。年红带着教育的理想, 秉持着同样的理念, 要通过文学作品, 把儿童教育成品格完善的人。

四、赞美和表扬好儿童

年红在作品中刻画需要改善行为的儿童形象, 也构建成人本位下的理想儿童形象。年红是一个教育家, 在他眼中, 成长中的儿童如果有缺点, 是需要教导和引导的; 至于品行良好, 符合传统价值观的儿童, 是其他儿童学习的榜样, 他们应该被赞美和表扬。年红希望儿童读者通过阅读这些作品, 培养社会所认为的正确价值观, 塑造美好的人格, 做个好儿童。

年红在作品中刻画了不少由始至终遵循长辈教导, 并将长辈的言行视为准绳的儿童形象。这些儿童在遇到问题时, 会牢记长辈的金玉良言, 时刻警惕自己, 谨慎行事, 不让自己犯错。比如, 在儿童小说《流花河》中, “我”在发表意见时, 都会思及老师的教导: “缺德! 破坏森林, 就是破坏环境, 老师是这么说的。”(年红 1997: 42), 在教育广播剧本《捣蜂窝》中, 沙林和木度一同婉拒大牛同学邀约前去捣蜂窝的建议, 先后说到老师的劝导: “老师说过, 捣蜂窝, 那是很危险的事!” “是呀, 沙林说得对, 老师是这样劝过我们的。……老师说过, 蜜蜂会蛰人的! ……老师说, 蜂刺是有毒的, 被蛰了, 可不得了啊!”(年红 1976: 6-7)

在《毛毛的羽毛球拍》中, 毛毛认为购买新式羽球拍是球赛获胜的关键, 因而强迫父亲购买两支羽毛球拍给自己, 不过, 毛毛却被手握旧式木柄羽毛球拍的对手打败。毛毛终于意识到自己的愚昧和不听父亲劝告的结果, 自言自语地说道: “爸爸, 以后我一定听你的!”(年红 1988: 23) 年红也把同样的儿童形象和故事架构应用到其他体裁的创作中。例如: 1976 年发表的教育广播剧本《助人为快乐之本》中, 赵忠明在经历短暂失明, 感受到残疾人士痛苦后, 说道: “不, 我能帮助那些不幸的人, 我感到高兴。怪不得老师要说: ‘助人为快乐之本’!”

唔，这话儿，一点儿也没错！”（年红 1976: 5）；2008年发表的幼儿童话〈小乌鸦学唱歌〉中，小乌鸦独面对饥寒之时，想起母亲的话：“它飞来飞去，又饥又冻，这才想起了妈妈的话：‘哪会有唱歌的乌鸦呢？快去学学干活儿吧。’”（年红 2008: 23）

《流花河》中的“我”，《捣蜂窝》中的沙林和木度，他们都谨记长辈的教导和劝诫，并以长辈的话作为判断行为对错的准绳，做出成人认为正确的决定或选择；不听长辈教导而被蜜蜂蛰咬入院救治的大牛，不听父亲的劝告而最后败北的毛毛，都说明了不听取长辈教导和忠告的结果。年红借这些儿童的遭遇和谨记长辈教导的儿童形象，向儿童读者传达虚心听取长辈教导的重要性，教育儿童读者在做出决策和采取行动之前应该紧记和听从长辈的教诲，也教育儿童读者应该持有实事求是的态度，依靠努力实现目标。

年红在儿童文学作品中的教育观念与华人传统文化中推崇的“父为子纲”的思想有着密切关系。比如，在《弟子规》“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的规条，强调孩子需听从父母的指示与教诲。年红身在教育界，视教育儿童为重任，一心一意要给儿童灌输正确的价值观，培育具有美好人格和道德修养的儿童。因此，在刻画理想儿童形象之时，自然会站在成人本位的视角构建这些能谨记成人教导、能够虚心听取长辈教诲的理想儿童形象。中国儿童文学家樊发稼在〈明朗质朴富于思想理趣——读年红儿童小说集《一把大雨伞》〉中曾这样说：“对少年儿童在思想感情、道德情操、品性修养等方面起到积极、正确的引导、启迪、示范、激励作用，从而有益于孩子们的健康成长。”（转引自年红 2014: 42）显然，年红借虚心听取长辈教导的儿童形象教育儿童读者的儿童文学概念，希望能对儿童起到示范、警惕作用，以达至有益于儿童读者健康成长的写作目的。

儿童与成人一样，经常会在团体生活中跟同学或者在日常生活中跟长辈发生矛盾和冲突。身为教师和家长的年红，年红选择站在成人一方，刻画顺从长辈意愿的儿童形象，并对这些儿童加以赞赏。比如：年红 1983年发表的儿童小说〈小卡车〉中，大榴槌仔和小榴槌仔虽不认同父亲为安慰邻家孩子而强迫他们送出心爱小卡车的做法，但最终还是亲自把卡车送出去；他俩也在父亲的劝告之下，压抑自己的好奇心：“‘听见吗？爸爸说没什么好看的。’大榴槌仔对弟弟说。……小榴槌仔眨了眨眼，咬了一下嘴唇，说：‘是没什么好看的。走就

走!’”(年红 1986: 16) 故事结尾, 年红通过无牙伯终于露出笑容的描写赞扬他俩的表现, 把成人对儿童乐与他们分享的期待明确地展现出来: “说完了话, 他伸出双手, 一手抚摸着一个孩子的头。他那很少笑的嘴巴, 终于笑了起来。”

(年红 1986: 31) 显然, 年红是希望儿童读者能在阅读之中习得大榴槌仔和小榴槌仔的大方品格, 做个能够听话和懂事, 顺从长辈意愿的儿童。

除了〈小卡车〉, 年红也在其他故事中塑造从长辈角度思考的儿童人物, 比如: 1976 年发表的教育广播剧本《新同学》中, 赵山猪同学在结交新朋友后, 不是为自己开心, 而是想到了父亲: “赵山猪紧紧地握着他的手, 低声地说: ‘爸爸知道我有新朋友, 一定很高兴的。’”(年红 1984: 12); 2019 年发表的〈“烂番薯班”的孔老师〉中, 孔老师虽没为破口大骂学生一事道歉, 李小珠同学不但没有把这一事放在心上, 反之还替孔老师解围, 劝离校的“我”回校上课: “‘我明白了, 是他要你回来的。’李小珠说: ‘你应该回来的。日后, 相信你会和我们一样喜欢上他的课。’”(年红 2019: 6)

以上故事中塑造的儿童人物, 不管是教育广播剧本或儿童小说, 皆受到华人文化中“父为子纲”及“孝亲敬老”儿童教育观念的影响。所谓“孝”, 在华裔社会中, 成人将儿童听从长辈教诲, 顺从长辈的意志视为孝(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 2016: 1445)。在华裔社会里, 更有百善孝为先的传统文化观念。在此观念之下, 成人希望儿童听从成人的劝告, 做决定或行动前先考虑成人的看法。深知与认同华人传统儿童教育观念的年红, 因而在作品之中刻画理想的儿童形象, 以通过作品培育出能够虚心听取长辈教导和顺从成人意愿的好儿童。这样的儿童教育理念, 符合华人的传统文化, 基本上会得到华人社会的接纳和认同。

年红基于成人本位的儿童文学观念, 创作出指导儿童纠正行为的教育性质儿童文学作品, 刻画一个个成人本位视域下的儿童形象——问题儿童和理想儿童。这些问题儿童形象在遭遇挫败和教训之后改变为成人眼里的理想儿童形象; 而理想儿童形象展现成人期待的儿童形象。因此, 年红的儿童文学作品富有华人传统教育文化的特点, 带有鲜明的教育寓意。读者也可以通过年红的儿童文学作品了解到华人传统的儿童教育观念和儿童文学观。从 1962 发表的《自作聪明的猎人》中的沙哈伦至 2019 年发表的〈“烂番薯班”的孔老师〉里的“我”, 都是年红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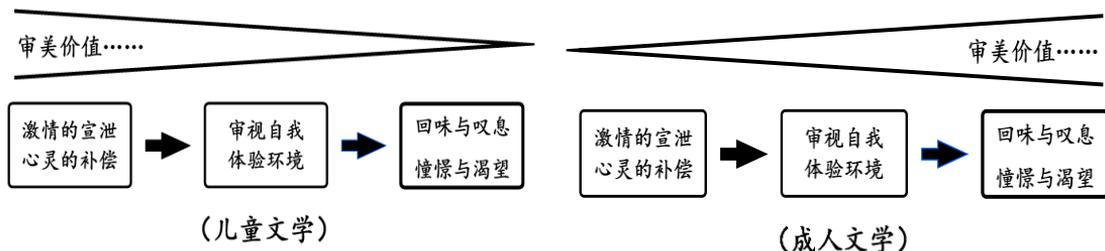
在成人教育儿童读者而构建出的儿童形象。年红坚持秉承成人本位的观念创作儿童文学的理念从来没有改变。

五、成人本位儿童文学观的几点思考

1960年代开始，年红与同期的儿童文学作家以传承华人文化的使命和教育儿童读者为目的，倾向站在成人本位视角创作儿童文学。与年红相同的儿童形象也出现在其它马华儿童文学作家的作品中，成为大家认同的写作方式，例如马汉<家是温暖的>中离家出走的金宝（1998: 1-18）、艾禹<小广的秘密>中不负责任的小广（1998: 11-15）、傲雪<飙车害了他>中叛逆的志翔（1998: 11-23）等，都是被设定为由问题儿童转变成懂事的儿童形象，以达到教育儿童读者的目的。

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儿童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人们对儿童的认知和定义已经转变。儿童不再被视为缩小的成人，反之被描绘成拥有无限发展可能性的精神胚胎。例如，蒙台梭利（*Maria Montessori, 1870-1952*）认为：“儿童只有生活在一个不受约束的环境中，即在一个与他们的年龄相适应的环境中，才能使他们的心理生活自然而然地获得发展，并展现他们内心的秘密。如果不坚持这条准则，未来的教育就只能使儿童陷入更深的混乱中”（玛利亚·蒙台梭利著 2012:105-106）。

对儿童形象的观念转变，让儿童文学作家和研究学者反思成人本位儿童文学观的不足之处，进而日渐重视儿童读者的阅读反应和阅读感受。艾登·钱伯斯（*Aidan Chambers, 1934-*）在 1978 年发表的《书中的读者》一文中，质疑成人本位的儿童文学创作对教育儿童成效，他认为：“儿童读者还不会按照书本内提供的建议来改善自己的个性”（*Chambers 1978:3*）；而刘绪源则在《儿童文学的三大母题》中，根据读者的阅读审美机制，提到儿童读者和成人读者的阅读审美侧重点并不相同：“在儿童文学中，情况正好相反：侧重点越是靠前的作品，审美价值越高；越靠后，则审美价值越弱。所以，再靠后的那两种文学作用，即归入‘审美结果’的‘从静观到超脱’与‘攫人心而入世’，常常在幼儿文学中排不上号了”（2009: 79）。



资料来源: 取自刘绪源 (2009: 79)。

图一 儿童文学和成人文学审美价值的异同

根据两位学者的观点, 儿童读者阅读的目的并不是要受到教育, 而是期望在阅读过程中获得激情的宣泄和心灵的补偿的阅读体验, 弥补生活中无法如愿和无法尝试的生活体验。这意味着围绕教育寓意而开展及带有教训意味的儿童故事, 并非儿童读者, 特别是低幼儿童读者首选的儿童文学作品。

另一方面, 儿童文学作家也在儿童教育和儿童文学观念的发展过程中, 日渐重视儿童读者的阅读需求。约翰·洛威·汤森在分析西方儿童文学发展史的过程中, 发现英美两国的儿童文学作家自 1950 年代开始转向创作基于儿童心理的儿童文学作品, 也发现儿童文学创作观念的转变导致“父母永不犯错且子女须听话的观念一消失, 随即带来一个正面的结果: 许多具有高度个人色彩的儿童角色出现了。”(约翰·洛威·汤森著 2003: 279) 日本心理分析师河合隼雄 (1928-2007) 在《孩子的宇宙》(2014) 一书中, 借儿童文学作品中的儿童人物形象揭示儿童的心理活动的例子, 证明创作基于儿童心理的作品是一个儿童文学作家可以努力的创作方向。儿童文学作家可在通过不断地探索和思考儿童的定义, 逐步走进儿童的内心世界, 创作出契合儿童阅读心理和需求的作品。

与此同时, 马来西亚教育部也意识到儿童观念的转变, 因而顺应世界教育发展的趋势,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倡的“四大支柱”作为教育改革的基本参照, 推动教育改革 (Kementerian Pendidikan Malaysia 2018: 1)。教育部为了培育拥有竞争力, 具有批判性和创造性思维以及创新能力的新一代, 自 2011 年起逐年落实小学新的课程标准 (KSSR), 并于 2017 年逐年落实小学课程标准 (修订版) (KSSR Semakan)。在新课程标准中, 儿童的搜索能力、批判思维能力、终生学习能力受到重视。教材的编写与教学都强调以儿童本位为导向。

马来西亚儿童教育的改革正在进行之中，过往灌输知识的教学方式，以教师为主的应试教育模式逐渐改为以儿童为主体的学习活动。国家儿童教育观念的转变，必然也会逐渐改变人们的儿童教育观念以及儿童文学观念。有鉴于此，马华儿童文学作家应该站在现有的儿童教育观念之上，创作出符合当代教育理念、时代需求的儿童文学作品。我们期待将来马华儿童文学作家，也能在探索儿童心理和需求的过程中，在作品中创作出一个个不仅具有高度个人色彩的儿童人物，同时也符合现代儿童读者阅读需求的儿童文学作品。

参考文献

- 艾禺（1998）。《妈妈的玻璃鞋》。新山：彩虹出版有限公司。
- 傲雪（1998）。《校园风波》。新山：彩虹出版有限公司。
- 方修（2017）。《鲁迅在东南亚》。新加坡：八方文化工作室。
- 河合隼雄著（2014）。《孩子的宇宙》（王俊译）。上海：东方出版中心。
- 刘绪源（2009）。《儿童文学的三大母题》。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马汉（1998）。《家是温暖的》。新山：彩虹出版有限公司。
- 玛利亚·蒙台梭利著（2012）。《童年的秘密》（蒙台梭利丛书编委会译）。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
- 年红（1986）。《爸爸的金龙鱼》。麻坡：南马文艺研究会。
- ____（1976）。《爸爸的老师》。吉隆坡：东方文化机构有限公司。
- ____（1977）。《播种的人》。新山：泰来出版社。
- ____（1976）。《捣蜂窝》，吉隆坡：东方文化机构有限公司。
- ____（2005）。《儿童文学40年》。新山：彩虹出版有限公司。
- ____（1962）。《黄瓜公主》。新加坡：星州维明公司。
- ____（2008）。《骄傲的多脚王子》。新山：彩虹出版有限公司。
- ____（2019）。〈“烂番薯班”的孔老师〉。出处廖冰凌（主编），《马华系列·儿童文学特刊‘童言无忌’》。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6。
- ____（1998）。《离群的小海鸥沙沙》。新山：彩虹出版有限公司。
- ____（1997）。《流花河》。新山：彩虹出版有限公司。
- ____（1976）。《妈妈，我错了》。吉隆坡：东方文化机构有限公司。
- ____（1988）。《魔轮》。麻坡：南马文艺研究会。
- ____（2009）。《年红儿童文学选》。新山：彩虹出版有限公司。
- ____（1979）。《文坛漫步》。吉隆坡：东方文化机构。
- ____（2008）。《喜欢乱扔东西的东东》。新山：彩虹出版有限公司。
- ____（2008）。《想当英雄的小花猫》。新山：彩虹出版有限公司。
- ____（1984）。《小飞侠》。新山：长青贸易公司。
- ____（2008）。《小蜜蜂生病了》。新山：彩虹出版有限公司。
- ____（2008）。《小乌鸦学唱歌》。新山：彩虹出版有限公司。

- ____ (1976)。《新年礼物》。吉隆坡: 东方文化机构有限公司。
- ____ (1976)。《学生剧场丛书》。吉隆坡: 东方文化机构有限公司。
- ____ (1989)。《一把大雨伞》。麻坡: 南马文艺研究会。
- ____ (1976)。《助人为快乐之本》。吉隆坡: 东方文化机构有限公司。
- 佩里·诺德曼著 (2008)。《儿童文学的乐趣》(陈中美译)。上海: 少年儿童出版社。
- 约翰·洛克著 (2005)。《教育漫话》(杨汉麟译)。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 约翰·洛威·汤森著 (2003)。《英语儿童文学史纲》(谢瑶玲译)。台北市: 天衡文化图书有限公司。
- 朱自强 (2015)。《朱自强学术文集 3——儿童文学概论》。南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
- Chambers, A. (1978). The Reader in the Book: Notes from Work in Progress. *Children's Literature Association Quarterly* 1978, 1-19.
- Kementerian Pendidikan Malaysia. (2018). *Kurikulum Standard Sekolah Rendah Bahasa Cina Sekolah Jenis Kebangsaan Cina—Dokumen Standard Kurikulum dan Pentaksiran*. Putrajaya: Bahagian Pembangunan Kurikulum.